

毛泽东为什么要给老战友荐读《黄琼传》《李固传》

□ 徐中远

舜之君，此为志士终无时矣。常闻语曰：‘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弘此远谟，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此封书信与《黄琼传》《李固传》二传中还有不少充满唯物论、辩证法思想的言论和文字。例如：“穷高则危，大满则溢，月盈则缺，日中则移”“表曲者景必邪， 源清者流必聚”“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等等，这些充满唯物论、辩证法思想的名言警句，毛泽东很有兴趣。据记载，毛泽东曾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念过这几句话。他认为：《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好书、好文章，充满唯物论、辩证法思想，他不仅自己爱读、读了又读，还习惯批送给其他中央、国家领导同志读。《黄琼传》《李固传》都是他很感兴趣的，也是他很爱读的。所以，他亲手在书的封面上分别批写了送上述几位领导人阅的内容。

第二，是意在提倡黄琼、李固能以国家大事、社稷安危为重，不计个人名利官职，正直敢言，谏诤君主的致仕之道，以在领导干部中树立善于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的正风正气。

东汉时，外戚、宦官相互倾轧，争相专政擅权。大将军梁冀的两个妹妹分别是顺帝、桓帝的皇后，梁冀垄断朝政，骄奢横暴，不可一世。顺帝时，黄琼两次被举荐到朝廷做官，黄琼出来做官后，经常上书直言规劝顺帝，所提批评和建议多被采纳。顺帝死后，梁冀和梁太后先后立冲帝、质帝，两帝在位的时间都很短。其后桓帝立，拟褒崇梁冀，说梁冀功劳可与周公相比。黄琼不畏惧梁冀的权势，在众人随声附和中，只有他坚决反对。他举出萧何、霍光等为例，认为“赏必当功，爵不越德”，桓帝接受了这个意见。永兴七年，黄琼重病在身。临死前，仍上书直谏：圣人位居人上，以德义为首；到危及国家政权时，则把贤人作为主要力量；对上天不以仁义的名分，办事情不以贤人作为主要力量，终于导致颠覆，使汉室国统灭绝。陛下听信谗言，导致太尉李固、杜乔，忠心直言，以德辅政而亡其身。黄琼为了汉室江山社稷，还这样净言进谏，可见其对国对君的一片忠心。

李固也是汉顺帝时的人，“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遂览坟籍，结交英贤。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李固多次上书汉顺帝，规劝他慎重选用官员，协助他整顿朝纲，为天下树立榜样。他说：“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洁，犹叩树本，百枝皆动也。”质帝时，李固被委任为宰相。他任职后，“其黄门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专，每相忌疾。”质帝死后，李固认为清河王刘蒜，年岁大又有德行，想拥立他为皇帝。他在给梁冀的信中写道：“传曰：‘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梁冀听不进李固的忠言，反而立了他的妹夫蠡吾侯，是为桓帝。李固后被梁冀诬陷杀害，死时54岁。李固两个儿子后来也被杀害，小儿子改名赵姓做酒店的伙计，后被朝廷任命为议郎，在职两年去世。

除了上述两个方面主要的缘由之外，以书交友、以书会友、以书联友，以书传递、交流老朋友心里想说而一时还没有说、还没来得及说的想法、看法、认识、观点、思考、思虑等心理因素有没有关系呢？笔者认为，应当是有关系的。用读书来进行心理的交流，启发思考，相互激励，弘扬正气，这是毛泽东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用的一种独特的老战友之间的交流方法。

（作者系毛泽东晚年图书馆管理员、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原局长）

从辛亥到五四：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 孙建昌

辛亥革命前10年间，以留日学生为译介主体的新思潮的传播形成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第一波浪潮。辛亥革命后，当民国肇建初期的政治纷扰告一段落，中国思想界谈论社会主义的声音又开始变得热闹起来。

（一）

1912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总部发表题为《社会主义之发生与派别》的演说，高度评价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贡献。他在演说中指出，马克思“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有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孙中山乐观地预言：“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

在孙中山的积极倡导和影响下，谈论和研究社会主义曾经风靡一时。江亢虎领导的中国社会党，出版《社会星》《社会党月刊》《新世界》等多种刊物，所发表的文章多有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介绍。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出版的《新世界》半月刊，在1912年5月至7月连载施仁荣翻译的《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一、二节和第三节的部分内容，这是我们看到的该书最早的中文节译。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曾经提及此事。他说：“据说还有一个什么人，在一个杂志上译过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912年6月，《新世界》第2期刊登了朱执信译述、燕生整理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

称赞《共产党宣言》“不啻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之引导线，大同太平新世界之原动力”。

除了孙中山和江亢虎，民国初年高谈社会主义的人士和刊物也不在少数。

（二）

1915年，以《青年杂志》（第2卷起更名为《新青年》）的创办为标志，中国思想界开始了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为各种新思潮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1917年11月，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爆发。中国的许多报刊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进行了报道和评论。1918年10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发表关于欧战的演说稿《庶民的胜利》和专文《Bolshevism的胜利》。在《庶民的胜利》中，李大钊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的失败、劳工主义的胜利。他预言：“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这让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和新的依靠力量。

五四运动前夕，国内出版的报刊上开始出现专门介绍马克思生平和学说的文章。此前，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大都是在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和文章中被提到，很少有专文介绍。1919年4月1日至4日，北京的《晨报》副刊发表《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一文（《新青年》第6卷第5号予以转载）。作者渊泉（即陈博贤）开篇即表明，他向读者介绍“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的奋斗生涯，有两大用意，

英烈殊勋如大泽山巍然屹立

——大泽山抗日英雄纪念碑碑文敬读

□ 郑宁波

一条宽阔的胶莱河将齐鲁大地分割为东西两大板块。华北平原在胶莱河畔收住了脚步，过了胶莱河，就是高低起伏的胶东山地，大泽山则是胶东自西向东的第一座大山。在巍峨的山脚下，在潺潺的溪水边，位于山东省平度市的高家村矗立着一座抗日英雄纪念碑。纪念碑正面刻有“抗日英雄纪念碑”7个鎏金大字，背面刻有碑文（标点为引者所加）：

正义必胜，人民必胜，江山永固。一九三八年，日军入侵平度，长达八年之久，其罪行罄竹难书。各界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广大爱国志士赴汤蹈火，前仆后继。抗战英烈气壮山河，与天地共存、日月同辉，如大泽山巍然屹立。英烈殊勋，名垂青史，立碑永志。

**平度市人民政府立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五日**

碑文讴歌了大泽山地区广大爱国志士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颂扬了与天地共存、日月同辉的英烈殊勋，阐明立碑永志的目的，读来感人至深、催人奋进。

挑起胶东中西部抗战大梁

1938年2月，日军侵占位于潍县和青岛周边的平度县。国民党平度县政权分离崩析，日军肆意烧杀掠夺，平度大地满目疮痍，很多村镇遭受敌机轰炸。日军暴虐恣睢，频繁制造惨案，平度哀鸿遍野，硝烟弥漫，瓦砾成堆。胶东大汉体格健壮，成为日军抓捞劳工的重要对象，仅平南被抓去修建高（密）平（度）公路的劳工就达数千人。修筑这条总里程仅45公里的公路，共死伤了200多名劳工，群众悲叹“修成高平公路，一里死伤两人”。劳工还被转移到中国东北和日本等地，几乎无人活着回来。8年间，日军在平度残杀百姓2000余人，抓捕劳工万余人，烧毁民房12000余间，掠夺财产不计其数，罪行罄竹难书。

日军的暴行激起平度人民英勇的反

抗的大小战斗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大泽山根据地由小到大，抗日武装由少到多，抗日烽火由弱到旺。党组织以大泽山抗日根据地为依托，同日伪反动势力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在平度乃至胶东中西部抗战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丰功殊勋，名垂青史

大泽山根据地是胶东党政军机关的重要驻地之一，为党领导胶东抗日提供了重要依托，为胶东培养输送了大量干部战士。1939年，胶东党政军机关驻进大泽山根据地，大泽山成为党领导胶东抗战的心脏。1941年胶东党政军机关向东转移后，隶属于胶东区委的西海地委常驻大泽山脚下有“小莫斯科”之称的高家村。胶东区委党校、抗大支校等在大泽山根据地举办多期训练班，共培养千余名干部。这些干部被分配到党政军各部门，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大泽山根据地由此被称为“胶东干部库”。大泽山根据地还输送了大量战士，从全国抗战爆发至抗战胜利，仅大泽山主峰方圆二三十公里内的平北山区就有2108人参军。党在大泽山根据地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以及民兵等，很多整编为主力部队。

大泽山根据地发明了在抗战中被广泛采用的地雷战。抗战时期，仅大泽山主峰所在的平度就配合主力部队作战2700余次，歼敌20000余人。如果算上周边招远、莱阳、掖县的抗战力量，则可以说大泽山根据地承担了胶东中西部抗战的主要任务。1941年，大泽山西麓6个村组建的民兵联防，利用当地丰富的石材发明了石雷，又在石雷的基础上发明了40余种地雷，重创了日伪军，以至于日伪军中流传着“进了大泽山，把命交给天”的说法。大泽山被誉为“石雷之乡”，地雷战成为抗日战争中广泛使用的战术。

大泽山根据地是胶东抗战物资供应

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同期的“马克思研究”专栏还刊载了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录自《新中国》）、渊泉的《马克思奋斗的一生》（录自《晨报》）等文章。

除了《新青年》和《晨报》副刊，五四时期的其他著名刊物，如《国民》杂志、《觉悟》（《民国日报》副刊）、《建设》杂志、《共产党》月刊等，也发表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许多译介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文章发表。1919年11月至12月出版的《广东中华新报》，发表了杨匏安的《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一文，文中说：“马氏以唯物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也。”这是五四时期国内报刊首次发表的把马克思主义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此外，1920年11月7日创刊的《共产党》月刊第1号，首次发表了《列宁的著作一览表》和《列宁的历史》两篇介绍列宁主义的文章。

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开始多了起来，但那时，人们能够看到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还不多。李达回忆说：“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很少翻过来，我们只是从日文上看到一些。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得自日本的帮助很大，这是因为中国没人翻译，资产阶级学者根本不翻译，而我们的人又都翻不了。”只有到了1921年前后，当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的大潮才真正开始涌动起来。



基地和交通运输枢纽，为抗战胜利输送了大量物资。1941年，大泽山根据地建立起兵工厂，制造和维修了大量武器。从1937至1945年，仅大泽山主峰周边的平北地区就支援民工14556人，担架2794副，小车1056辆，军粮227.5万余斤，军鞋12700余双。渤海走廊是胶东连接山东和全国其他战略区的唯一通道，胶东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渤海走廊运到四方，大泽山就是渤海走廊的枢纽。大泽山根据地还是重要的情报集散地，我党在平度建立了40余处情报站，编织起密集的情报网，打通了各级党组织之间的联系，为打击敌人提供了准确信息，为全国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